

■新作聚焦

范小青长篇小说《不易堂》：

于寻觅中传递情感与信念

□刘燕

范小青最新的长篇小说《不易堂》，初看标题，便能品出一股浓郁的“苏味”。细细读来，小说层层嵌套的叙事结构，令人宛如置身于纵横交错的苏州小巷中，跟随作家步步深入，读者也像踏进一座古朴的苏式老宅。在这座宅院深处，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失落、关于“不易堂”的谜团与真相，无一不在作家恣意又细腻的笔触下渐次铺陈，闪烁着人性的微光。

小说以寻找“不易堂”为主要线索，讲述了主人公“我”言子陈因研究课题“已毁古建筑现状评估”而重返离开多年的苏州故里。机缘巧合下，因为老宅言桥巷7号的产权及拆迁补偿，“我”不得不亲自回到老宅，并偶然与想象中的幼年伙伴尹重逢，由此引出关于老宅、关于不易堂的诸多陈年旧事。

寻找“不易堂”的过程是不易的。这个地处苏州的古代建筑群，最先出现在清代流传以来的书籍《古城烟水》中，被记载为徽籍言氏宅，位于言桥巷，“屋宇数百，园林一座，并与言氏义庄合，号江南第一宅。”这般宏伟辉煌的古代建筑群，引起了言家人的注意。从言子陈的曾祖父言文彬开始，他为了帮面临牢狱之灾的兄弟言文良满足权贵的心愿，开始寻找不易堂，并得知古画《春日家宴图》描绘了不易堂初建的全貌全景，找到古画就能找到不易堂。虽然言文良偷偷潜逃，再无寻觅不易堂的理由，但言家后人却仍锲而不舍地寻找着古画。无论是言子陈的爷爷言耀亭、言家曾经的管家余白生及其儿子余又、老宅里的邻居老朱，还是与“我”同辈的朱玲玲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秉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懈地寻找着古画和不易堂，直至最终将寻找的接力棒交到“我”手上。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阐述找到古画乃至不易堂的意义，甚至不断以各种荒诞、玄妙的巧合与不可靠的叙述来消解寻找的可能性。譬如神秘出现的幼年伙伴尹重，似真似假地讲述着旧时老宅的事件，在唤起“我”的回忆后悄然离去，就连“我”的微信联系方式也被她删除得干干净净，留下无尽的困惑；长期跟随在“我”身边的学生小白也颇有蹊跷之处，她隐瞒着自己的精神疾病，并且对寻觅不易堂有着超乎寻常的用心，在发现了名为《不易堂》的评弹后，引导“我”深入调查。然而，正当“我”以为这个评弹将揭开不易堂的来龙去脉之时，却发现它其实是由“我”的弟弟言子辰创作的，真假难辨……寻找古画和不易堂的过程充满了变数，种种悬念和巧合串联嵌套，每一个看似柳暗花明的时刻都会被随即而来的重重迷雾再次笼罩。“我”深知研究课题“已毁古建筑现状评估”内在的矛盾性，无法对已毁的古建筑群进行实地考察，只能从口碑相传或文字记载来展开研究，但我仍然将其提出并竭尽可能地想完成课题。换言之，即便“我”多年前因所爱之人余又的离世而深受伤害，自读大学起便远离故乡，与亲人断绝联系，但骨子里却始终和言家、余家、朱家的祖祖辈辈一样，有着一一种精神信念，执着地寻找物层面已不存在的东西。

纵观范小青的小说会发现，无论是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王全对“弟弟”的寻找，呈现出农民失去土地的创痛，还是小说《灭籍记》里对房籍的寻找，背后蕴含着对个体身份的探究和思考等，都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寻找不存在或不可能之存在的关注。进一步探析，书写寻找不存在或不可能之存在通常只是小说的表层，更深的意蕴在于“寻找”行为本身，其隐含着一种即便历史风云变幻，依旧精工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向无常命运抗争的精神，也是作家反复勾勒的。“糯”“韧”的苏州人品格，在小说《不易堂》中可见一斑——曾经是言家管家的余白生，不惜蒙冤屈辱离开家人，百般隐忍只为找到《春日家宴图》的踪迹；余又理解并支持父亲的选择，为了帮父亲拿回整理的相关资料，他沿着父亲的足迹一路回溯，却阴



范小青对苏州有着深切地情感认同，热衷于描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打捞新世情下人性深处的迷茫与痛苦，同时始终怀有一种温婉谅解的态度，从而能够孜孜不倦地发掘“寻找”行为本身内蕴的精神品质

范小青《不易堂》，载《钟山·长篇小说》2024年A卷

差阳错死于天灾，落得个尸骨无存的结局；邻居老朱爱好古玩，得知古画的讯息后找寻多年未果，临死前唯有将自己获得的线索以及相关的故事讲给“我”听，方才能安心瞑目……他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再微小不过的小人物，却以一种强烈的信念感挑战变幻莫测的历史和难以预料的命运，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人们所匮乏之。

不妨与范小青2022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家在古城》进行互文性阅读。在《家在古城》中，作家穿梭古今，运用非虚构手法，搜集了苏州历史、地理、文化等丰富的纪实材料，同时结合个人的见闻、创作史尽可能详实地书写故乡苏州。在此基础上，她对现代人的身份认同焦虑，以及人与城、地方性与全球化等关系进行了更为全面且深邃的思考，还由此提出了一则具有启发性的建议——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当代社会，或许唯有持续地寻找、书写、传递人们的真挚情感或精神信念，才能够为当代的人、城乃至社会、时代的发展召唤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而这种思考和启发也延续到了小说《不易堂》中。

沿着《不易堂》的文本肌理深入探析，范小青生长于传统文化韵味浓厚的苏州古城，那些无意识流露出的“姑苏情结”，譬如苏州的方言、园林、刺绣、评弹等，自如地在她笔下徐徐展开，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她对苏州了解之深刻、眷恋之浓郁。同时，她也亲身体验了全球化、城市化的势不可挡，不禁坦言：“我写作的文化背景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的一张网。”因此，我们总是会在她时而戏谑、时而温情的文字背后，感受到若隐若现萦绕着的忧患意识。可见，她敏锐地洞悉到时代的加速更迭，科技的日新月异令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现代人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也随之变化。正如小说中，为了城市的整体建设，承载着“我”过去回忆的老宅巷弄如今亟待拆迁，曾经居住于同一个宅子的邻里，如今早已四散搬离，只能在微信等虚拟空间里重建所谓的

“群落”，勉强维护彼此脆弱的联结，可一旦微信群被解散，便再难以轻松地寻觅到彼此。于是，小说中的“我”总是惊讶地发现，回到故里后新结识的人，竟然或多或少都与幼年邻居有着血缘关系，这种相见不相识的现象，令人深思。然而，作家并非只是在通过小说《不易堂》斥责现代化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入侵，呈现其如何大刀阔斧地将当代社会塑造成原子社会，人情淡薄、利己主义甚嚣尘上，而是试图在对新世态人情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反思之余，寻找、捕捉并突出小人物身上难以被遮掩的人性光辉，以此弥合人与人、人与城、人与世界之间的情感联系，为越来越陷入精神危机的当代人提供一丝心灵慰藉和信念支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范小青在精心雕琢“寻找”这一行为的精神内核之时，已然超越了对苏州的地方性书写，抵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精神世界的观照与思考。

“我对小说的态度，也就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既无可奈何，又温婉谅解。”诚如其言，范小青对苏州有着深切的情感认同，热衷于描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打捞新世情下人性深处的迷茫与痛苦，同时始终怀有一种温婉谅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发掘“寻找”行为本身内蕴的精神品质。因此，在小说的最后，所有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存在与否定“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寻找《春日家宴图》和不易堂的过程中，“我”重拾了对故乡、故居，尤其是关于故人的记忆，不仅为普通小人物执着坚韧的精神感动，也为其能够超越时空，搭建人与人、人与城、人与世界之间的情感纽带而喟叹。这大抵正是范小青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在故土渐趋衰颓、人情日渐冷漠的当代社会，作家更应葆有强烈的写作责任感和独特的写作气韵，坚定地探寻能够纾解当代人灵魂困境的精神信念，赋予个体与自我、与他者的联结以更深刻的意义。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长江文艺》《花城》《广州文艺》《青年作家》《作品》：生态、科幻与南方湿漉漉的潮气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态链条，也深深地参与文学生产、传播的全过程。科技革命正在建构新的价值序列与意义编码，今天的我们不仅无时无刻被数字赋形，科技伦理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新着我们对自我与世界乃至宇宙的认知与理解。对生态伦理、智能伦理的思考与勘探，促进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发展，发展出一种审视人类本体性存在的新视角。《长江文艺》第9期头条“聚光灯中国当代作家档案”推出深圳作家南翔，他长期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探索在一定的篇幅中高度浓缩地讲述故事，他对生物的关注、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麻醉师臂上的金雕》从生态与人文双重角度，经由动物与人的双向救赎、双向救赎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的精神重建融为一体，展示了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互动思索，拓宽了生态文学的叙事深度。马兵的评论相得益彰，他指出南翔的生态小说“有人”“有情”，这二者乃生态小说的重要指标，万物有灵也好，养物论也好，生态文学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文学”，健康的生态、多元的环境同样促进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小说坊”刊载了科幻文学专辑，周志强在《科幻文学：书写现实的新可能性》中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字科技、量子科技环境下，时空扭曲、文明迭代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底色……中国的科幻文学从‘用科技的方式去创作’（郑文光语），转变为‘因科技的发展而催生危机想象的写作’”，并提出科幻文学的“幽灵现实主义”写作路径。这个专辑中，青年作家梁宝星的《巴比伦铁塔》通过对机器人大战后凄惨场景的细致摹写，巧妙地实现了机器与人的身份置换，由此引发对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人性异化的诘问与反思。糖匪《大学》抛开了科幻小说惯有的故事性写作模式，以“心理写实”的方式，思考科技与人的情感伦理问题。宝树《坐标》沿用科幻文学星际叙事传统，叙写星际生物在自由意识觉醒之后，对强权的反叛与对抗。无独有偶，《花城》第4期“新女性写作”专栏推介的也是科幻作品。王侃瑜的《岛与人》中“人”与“岛”双线叙事并行，岛在海洋中，人在人海中，二者孤独的状态何其类似！修新羽《美好生活及其他》由三个不同主题的小短篇集展开，成，“淡蓝色立方体”围绕AI对人体的情感性写作模式，以“心理写实”的方式，思考科技与人的情感伦理问题。宝树《坐标》沿用科幻文学星际叙事传统，叙写星际生物在自由意识觉醒之后，对强权的反叛与对抗。无独有偶，《花城》第4期“新女性写作”专栏推介的也是科幻作品。王侃瑜的《岛与人》中“人”与“岛”双线叙事并行，岛在海洋中，人在人海中，二者孤独的状态何其类似！修新羽《美好生活及其他》由三个不同主题的小短篇集展开，成，“淡蓝色立方体”围绕AI对人体的情感性写作模式，以“心理写实”的方式，思考科技与人的情感伦理问题。宝树《坐标》沿用科幻文学星际叙事传统，叙写星际生物在自由意识觉醒之后，对强权的反叛与对抗。无独有偶，《花城》第4期“新女性写作”专栏推介的也是科幻作品。王侃瑜的《岛与人》中“人”与“岛”双线叙事并行，岛在海洋中，人在人海中，二者孤独的状态何其类似！修新羽《美好生活及其他》由三个不同主题的小短篇集展开，成，“淡蓝色立方体”围绕AI对人体的情感性写作模式，以“心理写实”的方式，思考科技与人的情感伦理问题。

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极大地释放了人的自我，曾长期被遮蔽的重获存在合法性，个体成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叙写个人成长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投射出时代、历史的某些触角。《花城》第3期李修文《南国之春》通过人到中年却屡遭失意的“我”的记忆，回溯性地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青年的欲望与焦虑。将个人的成长史叠入民族国家的改革史，相互映衬，深化了小说的历史重量。

《广州文艺》第5期李敬敏《海中金》、巫宏振《风中羽毛》描摹广漂青年的青春成长史、奋斗史，有原生家庭的成长之殇，亦有理想与现实抵牾下的无奈与酸楚，以及潜在的城乡阶层差异与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张运涛《我们的一九八三》以“我”在父亲去世后的返乡，追溯1983年一家人制造汽水、卖汽水的难忘经历，并以对成长往事的回望，唤醒、弥合着姐弟三人被岁月挤压的亲情感。第6期李率中《与一只猪握手》采用鲁迅式的返乡叙事，借“我”的主体视角打量故乡，在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实现自我的主体生成。《青年作家》第5期凸凹《模样》书写张广水从放羊娃到公职干部的成长蜕变。《作品》第5期梁小九《你知道轻井沢吗？》讲述了小彼得成长为速滑运动员的故事。小说在追忆人物成长动因过程中，描绘了其与其教练、队员相处的温馨场景，同时指出成长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伴随着伤痛和错误。吴宇仑《奶油蛋糕》可谓一个逆成长小说。奶油蛋糕这个意象极具张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诱惑，是对生日、成长的代指，另一方面奶油却具有破坏性，提供虚假的甜蜜的外表，它既暗示主人公的成长、奋进，也诱使其坠入深渊，人性的幽微、错综借此得以展现。

对地方性经验与知识的深描，愈益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重大文坛议题，这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高频流动息息相关。高铁、飞机在加速人群的流动速度；5G加速人群的通讯和虚拟空间的交集。一方面全球化是主潮，流动是大势；另一方面，地方特色越来越成为文学期刊的抓手。《广州文艺》第5期为“广州文学”专号，集中展现了南方的景观、民俗民情及地域特点。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的流入和不同地方文化的交融，南方文化更是处于文明互鉴、交融的风口。陈世旭《广州三记》以白云山平和、素净、冲淡的文化品质，花市的历史溯源及民俗景观，映射出广州人低调、务实、热爱生活的精神文化底色，并指出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明珠”的陈家祠超越族群文化的时代象征性。东方莎莎《广州人的精细与活泛》通过对出生地重庆与定居地广州、两座城市的美食、拖驳船等地方性知识的对照，展现出广州人精细、活泛的精神气韵。王威廉《写在中山大学百年之际》基于自身的求学、工作经历，揭开中大乃至广州的精神文化地理。周序《目送轮转间隙间盾构穿行》以地铁这一现代城市意象，叙写“外来人”他者视域下的广州，及对自我的文化诘问与人生归途的思考。《花城》第3期蔡崇达《草民》以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钩沉，聚焦闽南小镇的世相地志，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与生命哲学。《作品》第5期一容《野玫瑰》着眼草原风光，在牧马人离奇故事的叙述中，尽显喀纳斯草原的神秘与未知。《青年作家》第6期汪兰《蜀王陵随笔》描摹成都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和历史风物，展现出作家浓郁的恋地情结。

现代资本和消费文化也在不断侵入生活的内部，促成新的商业伦理。《花城》第4期丁颜《哑巴阿奎》中，阿奎离开草原来到古镇打工，但游牧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碰撞，使他成为一个失语的他者。屠宰场爆发的冲突颇具文化隐喻意味，当草原和古镇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步为消费意识形态所侵蚀，人与自然都将陷入现代文明病之中。《广州文艺》第5期叶曙明《码头上的广州》以对码头这一地理空间的追述，钩沉曾被称为“水上浮城”的广州的历史记忆，展现出其城市地理变化，古老商都绵延千年的传统商业文明，进一步审视现代文明在重塑城市空间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形态、广州人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影响。《青年作家》第5期王涛《隧道那一端》借由穿越叙事，建构自我的理想图地。小说在寻找的架构下经由空间的鲜明对照，展现了都市人对生命力复归的渴望。鱼生是“我”逃离此在、进入另一世界的牵引，“我”寻找他的过程，既是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对别样生活和深度自我的探寻。

(本文为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为：刘志珍、曾嵘、林蓓珩、许哲煌、邱文博、邱雯意、张韵茜。邱文博统稿，指导老师申霞艳)

■评论

写出英雄的精神之美

——评钟法权长篇报告文学《为珠峰测高的人们》

□刘笑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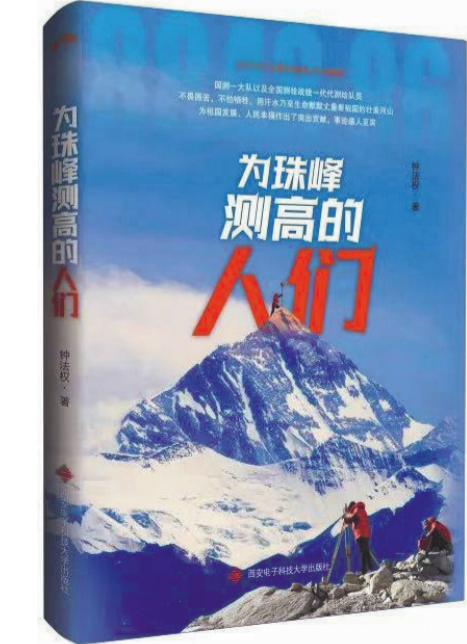
钟法权的报告文学《为珠峰测高的人们》讴歌“最美奋斗者”——国测一大队英雄群体，读罢深深为英雄们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量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举所感动。报告文学的魅力，在于能够真实记录时代的风云，直面描写生活的现场。所以，鲜明的时代感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而一部作品的时代感，则来自于作者通过扎实的采访、细致的观察、倾情的书写，对人物和故事的现场感再现。

成功运用现场感再现的手法，是《为珠峰测高的人们》这部作品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写出现场真实感，离不开作者扎实的采访。周立波曾說過，报告文学和小说要靠“调查研究来积蓄丰富的素材，要把事情的经过、人物的真实、场地的实景观察清楚了，然后才提笔伸纸。”观察越精微，场景越真实；采访越扎实，再现越生动。《为珠峰测高的人们》以为珠峰测高为主线，生动记录了国测一大队队员们勇攀珠峰、服务科考、勇闯生命禁区、报效国家的感人事迹。攀登珠峰的细节，作者写得非常生动形象，这离不开作者扎实的采访工作。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详细记述了2014年10月在青藏高原某兵站的采访经历，这些难忘的经历也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积淀。

面对大量的采访资料，如何确定作品的表现角度，往往考验一位作家的写作功力。《为珠峰测高的人们》一书的立意是写出国测一大队的英雄群像。作者将珠峰的险峻、攀登珠峰的重重困难作为背景，从而衬托出郁积

青、任秀波、李国鹏等几代测绘队员勇于拼搏、牺牲奉献、淡泊名利、服务人民的精神境界。登顶珠峰后，作为测量工具的红色“觐标”，是作者捕捉到的核心异象。这个红色的“觐标”，也成为测量英雄们精神海拔的工具。全书中，作者用最重的笔墨写的是第三章《红色觐标立珠峰》。这一章，正是作者确定写作角度的“立意”之所在。“比珠峰更高的是红色觐标，比觐标更高的是测量队员们的信仰”是本书的写作立意，正如作者所言，“虽然专写珠峰的只有三章，但这三章的篇幅却超过全书的二分之一，攀登珠峰、为珠峰测高是全书的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作者对写作对象认识越深刻，理解越到位，把握越准确，就越能找到最佳的表现角度，从而找到写作的立意和突破点。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一书的作者是一位军旅作家。“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纵观历史，军事文学始终以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为永恒主题，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全社会汇聚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强大正能量。本书作者钟法权正是很好地继承了军事文学的优良传统，以对党、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写出了测绘队员这个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我想，如果没有对英雄精神的书写，那么攀登珠峰、抵达南极，在唐山人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国测一大队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等等，也仅仅构成报告文学的背景。而只有发现了人物的精神，才会使人物产生立体感。作者为了衬托英雄的精神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钟法权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境界，还专门写了英雄们的妻子。本书第七章《半边天的奉献》，看似与主题并不太相关，却也是写作中的渲染之笔，对于刻画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作用。对英雄的书写，最重要的是写出精神。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序”中所写，“珠峰的雄壮之美，也是他们攀登珠峰的崇高理想之美、挑战极限的勇敢之美和无私奉献的忘我之美。这些美既是一种意蕴，又是一种象征，还是一种追求，更是与珠峰共存于天地之间的人间大美”。写出英雄的精神之美，也就找到了书写英雄的正确“坐标”，这或许就是《为珠峰测高的人们》一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

(作者系国防大学解放军文化学院副院长)